

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丛论

韦红一主编

国际视角下的 中非合作研究

赵长峰◎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丛论

韦红 / 主编

国际视角下的 中非合作研究

赵长峰◎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视角下的中非合作研究 / 赵长峰 著.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2

(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丛论/韦红主编)

ISBN 978-7-5622-7637-1

I. ①国… II. ①赵… III. ①国际合作-研究-中国、非洲 IV. ①D82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583 号

国际视角下的中非合作研究

© 赵长峰 著

责任编辑:王中宝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792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0.25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1 千字

定价:51.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中非合作关系的历史	5
第一节 1969 年之前的中非合作关系	5
第二节 1969 年—1976 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17
第三节 1976 年—1989 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25
第四节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非合作关系	34
第五节 21 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关系	43
第二章 新时期的中非合作关系	66
第一节 中国对非援助	66
第二节 中国对非贸易	82
第三节 中国对非投资	101
第三章 中非合作关系案例考察	113
第一节 中国与赞比亚的关系	113
第二节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	132
第四章 中非合作关系加强的动因	148
第一节 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的变化	148
第二节 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	152
第三节 非洲对中国的战略需求	160
第四节 中非合作关系的制度保障	165
第五节 中国对非政策与策略	170

第六节 中国对非政策——以石油业为例·····	186
第五章 对中非合作关系的评价 I ·····	188
第一节 整体中非合作关系评价·····	189
第二节 中国对非援助评价·····	206
第三节 中非贸易评价·····	227
第四节 中非投资评价·····	232
第五节 不附加条件与不干涉原则·····	244
第六节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249
第六章 中非合作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53
第一节 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竞争? ·····	254
第二节 中国和美国在非洲:合作? ·····	261
第七章 对中非合作关系的评价 II 及建议·····	268
第一节 西方对中国指责的虚伪性·····	268
第二节 中国调整对非策略·····	271
第三节 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建议·····	283
第八章 正确认识和发展中非合作关系 ·····	288
第一节 正视中非合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	288
第二节 构筑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98
参考文献·····	311
后 记·····	319

引言

自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非合作关系有了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学者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方面,中国在非洲的新角色与传统意义上的刻板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极具冲击力的新闻头条^①;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越来越深入地介入非洲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研究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的非洲政策,中国的非洲政策对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谁是真正的赢者和输者^②。许多以中非关系为关注点的学术期刊及著作认为中国的介入对非洲而言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威胁。有些倾向于将中国看作非洲的一个机会,因为南南合作导致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使非洲受益。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对此深表怀疑,认为这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③。针对国外的评论,国内也有学者给出回应^④,但总有言犹未尽之感,归结起来,无非是只针对某一专门评论给出具体回应,于是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鉴于

① Larry Hanauer, Lyle J. Morris,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Drivers, 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4, xi.

② Sanusha Naidu, *China in Africa: A Maturing of the Engagement?* Axel Harneit-Sievers, Stephen Marks and Sanusha Naidu, ed., *Chinese and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Pambazuka Press, 2010, p. 25.

③ Sanusha Naidu, *China in Africa: A Maturing of the Engagement?* Axel Harneit-Sievers, Stephen Marks and Sanusha Naidu, ed., *Chinese and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Pambazuka Press, 2010, p. 25.

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安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贺文萍研究员以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武教授等是国内知名的中非关系专家,他们对中非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也对国外相关论述进行了述评。作者从中大受裨益。

此,本书意在对外国有关中非合作关系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归纳与总结,将国外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各种解读呈现于读者面前。在此先说明几个问题。

(1) 关于“非洲”。非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无疑是指整个非洲大陆,其中包括了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从历史、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来看,北部非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国家,包括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和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简称 SSA,俗称“黑非洲”)有很大不同。本书所指的“非洲”有时指整个非洲大陆,有时则专指 SSA。

(2) 关于“中非合作”。第一,从范围来讲,“中非合作”包括所有领域的合作,但是本书重点介绍经济合作(援助、贸易和投资等),其次是政治合作,对军事(安全)合作、文化合作等只是少量涉及。

第二,从术语来讲,“中国存在于非洲”(China present in Africa)、“中国介入(或参与)非洲”(China engage in Africa)、“中国卷入非洲”(China involve in Africa)是国外学界、媒体、官方文件与声明经常使用的术语,本书将上述术语均视为“中非合作”(Sino-Africa cooperation 或者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的范畴。

(3) 关于“国际视角”。第一,只要不是出自中国籍作者(包括学者、媒体、官方文件和声明等)的关于“中非关系”的论述都被视为“国际视角”,换句话说,所谓的“国际视角”就是国外作者的观点与看法,其中,国外学者还包括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

第二,本书主要参考英文文献,很少涉及其他语种。限于作者外语水平,本书主要涉及英文文献,不包括阿非利加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种的资料。

第三,本书只参考国外作者的部分资料,而不是全部,实际上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献与资料。但作者尽力将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罗列出来。

第四,在本书引用的国外文献中,有两位知名中非问题专家的著作与文章引用较多,这两位专家是伊恩·泰勒(Ian Taylor)和黛博拉·布罗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伊恩·泰勒是英国圣安德鲁大学国际关系与非洲政治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是 SSA,目前已出版 8 部学术著作,发表 70 多篇学术论文,被评为“SSA 国际

关系最权威的学者之一”^①。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现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比较政治教授、中非研究中心主任,是中非问题的权威专家,已出版《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和《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等多部著作^②。

第五,在本书引用的国外文献中,有两家机构的报告引用较多,一个是美国审计总署(又称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简称GAO),另一个是兰德公司(RAND)。众所周知,这两家机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都赫赫有名,前者负责美国国内外项目评估和政策分析^③,后者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④,其报告的权威性及影响力毋庸置疑。近期,关于中非合作,GAO与RAND提出了各自的调查报告,分别是《美国与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参与》(Sub-Saharan Africa: Trends in U.S. and Chinese Economic Engagement,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ebruary 2013)与RAND高级国际政策分析师拉里·哈诺尔(Larry Hanauer)和莱尔·莫里斯(Lyle J. Morris)撰写的《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动力、反应以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Larry Hanauer, Lyle J. Morris,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Drivers, 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4)。这两份报告均对中非合作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尤其是后者。

(4) 其他说明。第一,尽管中非关系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中非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以及引起国外各界的高度关注还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因此,本书侧重于21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关系。当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中非合作关系,也需要对中非合作历史进行简要回顾。

第二,本书中间章节的重点是客观地罗列国外作者对中非合作关系的

①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25(1), p. 171. 有关伊恩·泰勒教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https://www.st-andrews.ac.uk/intrel/people/index.php/ict.html>。

② 有关黛博拉·布罗蒂格姆教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http://deborahbrautigam.com/>。

③ 有关美国审计总署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http://www.gao.gov/>。

④ 有关兰德公司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http://www.rand.org/>。

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失之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但出于尊重原始材料的需要,此部分不对这些观点进行逐一评论和修正。本书最后一章将专门论述中非合作关系,同时对中非合作关系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点评。

第三,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国外作者对中非合作关系的态度与评价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态度上,由不重视到重视;评价上,由偏向悲观到偏向乐观,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其一,事实胜于雄辩,中非合作关系的确为非洲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二,中国自身的确有很大改进,对中非合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纠正。

第一章 中非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非关系始于何时?有学者指出,中非关系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但是更多的作者认为,中非之间早在几世纪前便有接触,15世纪明朝航海家郑和及其船队就曾出访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当然,这些作者也基本认同,真正的中非关系始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但是如何划分从50年代至今的中非合作关系,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朱迪斯·范德龙(Judith van de Looy)就将中非合作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刚刚获得独立的中国和非洲国家建立起关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当中国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后毛泽东时期,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自由化与迅速发展阶段^①。然而其他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本书结合伊恩·泰勒的著述^②,将中非合作关系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69年之前的中非合作关系;第二阶段,1969年—1976年的中非合作关系;第三阶段,1976年—1989年的中非合作关系;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中非合作关系;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关系。

第一节 1969年之前的中非合作关系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界标,1969年之前的中非合作关系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① Judith van de Looy, *Africa and China: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 67/2006*, Leiden, The Netherlands, p.1.

^②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一、1949 年以前的中非合作关系

2014 年 10 月,由阿克苏姆大学(Aksum University)主办的探索古代中国与非洲联系的世界大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非洲、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一起探讨近期的考古和历史发现,所有证据表明,中国自古以来便与非洲有文化与经济联系^①。

早在汉朝(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220 年)时期,中国与埃及便有文化交流。非洲发掘了大量中国汉代物品,据称,埃及王后克利欧佩特拉(Cleopatra,在位时期公元前 51 年—前 30 年)曾身穿中国丝绸,约公元前 166 年,汉朝皇帝收到来自北非的礼物,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埃及。中非最早的人员往来是埃及一位魔术师于公元前 112 年到达西安。唐朝(618—907)时期,中国一位名叫杜环(Du Huan)的官员到达非洲^②。在桑给巴尔、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和津巴布韦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中国宋朝(960—1279)时期的硬币与瓷器碎片^③。

西方历史教科书大肆渲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是世界上航行到东非的第一人,他于 1498 年发现到达亚洲的航线,从此开启了欧洲海洋强国长达 450 多年的殖民统治。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明朝(1368—1644)时期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比达伽马更早到达东非^④。从 1405 年到 1433 年,郑和七下西洋,无论从距离还是规模上来看,他的航海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距离来看,他曾三次^⑤到达非洲东海岸;从规模来看,

^① China's Long History in Africa, *New African Magazine*, 11 March, 2015, <http://newafricanmagazine.com/chinas-long-history-africa/>.

^② Sithara Fernando, *China-Africa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Documents Using Shinn and Eisenman's Optimist-Pessimist Dual Framework*, *African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2014, 6 (2), pp.145-160.

^③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16.

^④ China's Long History in Africa, *New African Magazine*, 11 March, 2015, <http://newafricanmagazine.com/chinas-long-history-africa/>.

^⑤ 第五次(1417 年到 1419 年)、第六次(1421 年到 1422 年)和第七次(1431 年到 1433 年),先后到达摩加迪沙和不刺哇(索马里)、马林迪(肯尼亚)和索法拉(莫桑比克)等。

其船队由数百艘巨大的船只以及数万名水手和乘客组成,其中第一次航海时的60多艘船就是巨大的“宝船”,船长400英尺,宽160英尺,多层,9桅12帆,其套房还带有阳台,十分奢华。这种规模的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再次出现^①。除了规模及距离,更为人称道的是,在这几次的航行中,中国并没有表现出殖民非洲大陆的打算。在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演讲中,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在提及15世纪郑和航行到非洲东海岸一事时说,“郑和是与当地人进行商品交易,而不是像西方殖民者一样建立殖民地或从事贩卖奴隶活动”^②。他们“不侵占一寸土地,不掠夺一个奴隶,只给皇帝带回一头长颈鹿”。郑和每次所带的医生和药师都会带回非洲药草和当地的药方,用于治疗当时中国的传染病^③。丹尼尔·拉奇(Daniel Large)博士亦指出,中国进入非洲是出于相互尊重、友好,将非洲视为一个伙伴而不是一个潜在的值得剥削的地方^④。

郑和的东非之行被看作“1949年以前中国致力于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最高峰”^⑤。然而,进入清朝(1616—1911)时期后,由于中国朝廷主动放弃海上探险以及欧洲帝国扩张至非洲,中非关系几乎完全中断^⑥。只有在1897年,清政府代表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总领事馆,负责监管和保护已移民到南非的中国侨民。尽管如此,中国和非洲的联系仍然可以忽略不计。直到20世纪初招募中国劳工到南非开采金矿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善。然而,到1911年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非洲与中国的联系再次中断,尽管南

① *The Ming Voyages*, http://afe.easia.columbia.edu/special/china_1000ce_mingvoyages.htm.

② Tian Xuejun, Chinese Ambassador to South Africa,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for a Better Future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Speech to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IA), Johannesburg, 4 July, 2012.

③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3.

④ Daniel Large,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African Affairs*, Vol. 107, Issue 426, 2008, pp. 45-61.

⑤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16.

⑥ David H.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China and Africa: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p. 21-22.

非和中国于 1931 年建立了外交关系^①。

二、1949 年—1955 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与非洲的官方联系几乎没有。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忙于一系列国内外事务,并没有对非洲施行积极的外交政策^②。但这并不表明中非之间没有任何往来,来往主要是外交辞令上的。例如,1950 年 9 月,在写给南非印度大会(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简称 SAIC)领导人米尔(Meer)和赛特(J. Sigh)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支持该党反对种族歧视。不过,北京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南非是这一时期事实上唯一访问过北京的非洲国家。由于对中国政府有很深刻的印象,SAIC 的尤瑟夫·卡查利亚(Yusuf Cachalia)和米斯特里(D. Mistry)受到鼓舞,于 1952 年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支持其反对种族歧视的政策。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情,但这仍然只是口头上的。1951 年,在柏林举行世界青年节之后,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 ANC)秘书长瓦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访问北京。1952 年,ANC 的西苏鲁和杜马·诺奎(Duma Nokwe)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访问,显然,西苏鲁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农民与非洲农民的相似性。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此时非洲独立的四个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南非)中没有一个是承认北京政府^③。

三、1955 年—1959 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29 个国家出席会议,其中有 6 个非洲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对于中非合作关系而言,万隆会议的召开具有特殊意义,是一个极具开创性的事件,是社会主义中国首次试探性地与非洲大陆国

^①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16.

^②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17.

^③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19.

家接触与交往^①。由此,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篇章。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参加了万隆会议,他主张各国应求大同存小异,强调中国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或者帮助从事任何颠覆活动。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公开邀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京。1950年,中国与南非解放运动成员曾有过短暂(暂时)联系,这一联系在万隆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加强。由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一位经验丰富的非洲共产党员,ANC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的ANC和SAIC三人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摩西·考塔尼的共产党员身份使得中国与南非代表很容易建立起联系。

在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贫困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这为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万隆会议的制度化成果就是成立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简称AAPSO),中国在其中发挥着领导作用^②。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亚非会议具有重大且持久的重要性,“此次会议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它鼓励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促进亚非人民反帝和反殖民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中非关系第一次纳入中国的议程,尽管是和其他亚洲国家一起^④。

1955年,非洲国家正处于独立的关键时期,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⑤。亚非会议上,中国对反殖民主

①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19.

② 然而,由于AAPSO未能很好地协调世界行动,所以极大地挫伤了亚非团结的积极性。Garth le Pere & Garth Shelton: *Afro-Chinese Relations: An Evolving South-South Partnership*,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Autumn, 2006, 13(1), p.38.

③ Domingos Jardo Muekalia, *Africa and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ecurity Studies*, 2004, 13(1), p.5.

④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0.

⑤ Filip de Beule and Daniel Van den Bulcke, *China's Opening up*, from Shenzhen to Sudan, Meine Pieter van Dijk ed.,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4.

义的强调赢得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赞扬,因为非洲大陆当时正处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高潮,非洲国家希望能够找到盟友以帮助自己赢得独立战争以及获得斗争所需的资金支持^①。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非洲国家摆脱冷战期间战争冲突的天然盟友^②。

万隆会议后(1955年—1959年被称为“万隆时期”),中国开始注重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向非洲国家解放运动提供经济、技术和军事支持,积极鼓励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这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③。一开始,中国主要专注于加强与北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从1957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中国进行反法宣传,向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提供武器,并对军事人员进行培训。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与埃及纳赛尔政府的友好关系。1955年7月,中国同意购买埃及大量的棉花,8月22日,两国签署贸易协议。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贸易协议。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随后,当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时,中国除提供道义支持外,还派遣志愿者亲赴埃及。中国对埃及成功的外交接触使其他非洲国家看到中国的外交意愿和战略:中国对非洲很感兴趣并且极具真心实意^④。

1956年9月,外交部西亚非洲事务司成立,取代了之前的西欧和非洲事务司。这一改变表明中国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坚定立场以及对非洲的重视程度的进一步加深^⑤。

① Bruce Larkin, *Chinese Aid in Political Context 1971-1975*, Warren Weinstein, *Chinese and Soviet Aid to Africa*,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② Chaldeans Mensah, *China's Foray into Africa: Ideational Underpinnings and Geoeconomic Interests*,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10, 4(3), p.98.

③ Domingos Jardo Muekalia, *Africa and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2004, 13(1), p.6.

④ H. Kerr,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A. Halpern, *Policies Towards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New York: McGraw Hill, p.439. 转引自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21.

⑤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1.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通过对摩洛哥、苏丹以及突尼斯的访问,中国与北非国家的联系得到巩固与发展。摩洛哥(1958 年 11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1958 年 12 月 20 日)和苏丹(1959 年 2 月 4 日)成为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批非洲国家。中国此阶段参加国际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展与非洲的联系。1957 年末,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埃及举行,1958 年 4 月,第一届非洲独立大会在加纳举行^①。

四、1960 年—1965 年中非合作关系

1960 年—1965 年的中非合作关系比较密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苏关系破裂有较大关系。伊恩·泰勒指出,中国对非政策的转变与中苏分歧加剧的时间相一致,这意味着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成了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争执的焦点^②。通过发展与非洲的联系,北京意在加强其相对于苏联的地位,从受制的霸权中逃离出来。毛泽东构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意味着中国愿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北京因此寻求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加大了对非洲的介入力度^③。

在 1960 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与此同时,中非关系开启了一段崭新而又独特的时期。1960 年到 1965 年,中国外交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 14 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④。在中国看来,尽管这些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它们也能对国际体系产生积极影响^⑤。

进入 60 年代,中非代表团互访和非洲领导人访华成功地助推中非关系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的数量激增,1959 年 10 个,

^①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1.

^②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34.

^③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3.

^④ 1960 年:加纳、马里和索马里;1961 年:扎伊尔;1962 年:乌干达;1963 年:布隆迪和肯尼亚;1964 年:贝宁、中非、刚果(布)、坦桑尼亚、突尼斯和赞比亚;1965 年:毛里塔尼亚。

^⑤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3.

1960年增加到25个,到1962年更是增加到52个。非洲国家出访中国的代表团数量也迅速增加,1959年是50个,1960年达到98个^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Sekou Toure)访华,他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非洲领导人。杜尔总统的此次访问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在这次访问中,北京第一次承诺对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这是中国对非政策的一个分水岭^②。自此,非洲领导人对北京的访问开始增加,尼日利亚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前驻比利时大使阿拉巴·奥根桑沃(Alaba Ogunsanwo)指出,非洲领导人访问北京有三大重要意义:其一,表明中国领导人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与接受;其二,表明中国的外交行动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③。其三,表明中国不再孤单,盟友遍布世界,成功打击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阴谋^④。

1961年2月,亚非团结基金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会议指出,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为非洲解放组织提供支持。该组织是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on)解放委员会的前身。中国是成员国之一,并被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国。参与该组织使中国更容易为其他各类组织所接受,这是中国与非洲建立和发展长期联系的一种有效方式^⑤。

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⑥,主要目的之一是向非洲国家解释中国的非洲政策并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访问期间,为进一步促进中非关系发展,周恩来提出发展“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表明中非关系遵循以“和平

①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2.

② Alan Hutchi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75, 14(2).

③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1971*,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4, p.78.

④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4.

⑤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24.

⑥ 这十个国家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